

上海拉拉

中國都市女同志社群與政治

金擘路 著  
廖愛晚 譯

香港大學出版社  
香港薄扶林道香港大學  
[www.hkupress.org](http://www.hkupress.org)

© 2014 香港大學出版社

ISBN 978-988-8208-60-9

版權所有。本書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圖片，  
如未獲香港大學出版社允許，  
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襲或翻印。

10 9 8 7 6 5 4 3 2 1

盈豐國際印刷有限公司承印

# 目錄

序：想起（上海女愛工作組）	ix
譯者序：廖愛晚	xi
前言	xiii
鳴謝（英文版）	xvii
緒論：自我與社群的再連結	1
1. 形成中的拉拉社群	17
2. 公共論述	35
3. 家門內的困局	51
4. 周旋於公私之間	63
5. 表面的微笑：公共正確政治	77
結論：看見我們當中的多樣性	91
主要報導人簡介	97
參考文獻	101
索引	111

# 序

## ——想起（上海女愛工作組）

今年3月有一次在香港與Lulu（金嘩路）匆匆見面，想不到她竟然邀請我為她的學術著作中文版寫序，這難免一方面令我受寵若驚，而另一方面我又不禁覺得她實在夠膽大，敢讓我這種不善辭令的人寫點甚麼。因為我正值人生兵荒馬亂時期，所以遲遲無法下筆，也生怕自己寫得格格不入，想要推辭時，Lulu又寄了兩封電郵來，肯定又肯定地對我說「你的序對中文版很重要」，這樣的謬讚令我十分汗顏。

我時常說，在我參與同志運動的路上，最大的幸運是結識了許多有思想而又有力量的女權主義者，她們給了我很多對人、對平等的思考，而Lulu則是其中最為重要的一位，更可說是亦師亦友。我和Lulu從2005年結識至今，早已從普通網友變成為緊密的同志運動夥伴，她除了帶給我很多關於運動的思考之外，還與我談人生和理想，以及愛情（笑）。

與Lulu結識是因為她要為她的博士論文在上海進行田野研究，她把項目介紹發佈到我建立的華人拉拉網站「花開的地方」，於是我們開始了聯繫。第一次見面，她給我的印象是「謙虛大氣」之外，還有莫名的信任感。其中部分原因，也許來自拉拉身份的認同信任，以及我們彼此認識一些共同的朋友。

在我們認識後的幾年，Lulu一邊為她的研究花費精力，一邊給我個人、上海女愛工作組和志願者帶來越來越多的幫助、啟發。她每一次的上海之行，都給我們帶來大陸之外的同志訊息和書本，介紹我們認識香港的同志機構。

2007至2008年，上海女愛出版的第一本大陸拉拉口述歷史書《她們的愛在說：愛上女人的女人·上海·口述歷史（一）》，正是受到Lulu帶來香港拉拉口述歷史書本的影響。她擔任了我們口述歷史項目的培訓導師和顧問，幫助上海女愛完成第一個最重要的項目，而這本拉拉口述歷史也影響了中國各地的拉拉組織，紛紛開始籌劃各地的口述歷史計劃。

為了專注研究，Lulu 經常往返香港、上海兩地。她每一次從香港回來，都會和我見面，而我也樂意拉上一些朋友、女愛的志願者們與她一起聚會，因為我知道上海的拉拉朋友們很希望親耳聽到來自香港的拉拉訊息。雖然當時已經有了互聯網，但在拉拉的社交生活中，能面對面聚會交流的機會，其實甚少。我們對於與大陸有着不同體制的香港和台灣兩地的拉拉如何生活，她們又在經歷着甚麼，相當感興趣，很想與 Lulu 談論和分享，從而多了解和自己一樣性取向的人的生活經驗。

記得當初做拉拉口述歷史書的時候，眼見從古至今，華人世界極少地整理和收集拉拉、拉拉社群、拉拉歷史和研究的資料，所以我十分期待更多的像 Lulu 一樣的研究者，帶着社群視角，擁有多元觀察，展開社群的研究，使以往的歷史得到重現，也使後來者（包括同性戀或異性戀者）了解和正視我們走過的路。

我要特別感謝和我一起參與了這個研究的人們，謝謝你們的信任。

祝賀 Lulu《上海拉拉》中文版的出版。英文版出版後，就已經有好多朋友向我詢問中文版情況，可見我們是如此的期待。

想起（上海女愛工作組）  
2014 年 5 月 10 日於上海

# 譯者序

——廖愛晚

我們多多少少都有一個暱稱。網名，筆名，英文名，不一而足。在自己的暱稱和別人的暱稱當中，我們放心下來，我們開心起來。多年之後，我們或已熟識了對方登記在種種冊頁上的名號，卻仍用暱稱呼喚彼此。不僅僅是習慣使然，這重新命名的嘗試是對在既定規則之中逆水行舟的共同記憶，是對在已知必然之外開疆拓土的心照不宣。

2005年的初冬，在北京繁華地段的一間餐吧門前，我躊躇着是否邁步入內，對圍坐在那裏的陌生面孔說出我的另一個名字。初入大學的懵懂，從小城遷徙至首都的茫然，記事之初便揮之不去的孤獨，混合着大幕將啓的驚恐與興奮，那時的我並不清楚即將投身的這平生第一次女同志聚會，以及後來不計其數的聚會、座談、工作討論、志願者培訓、街頭倡議、校園講演，將會如何改變我的人生軌跡。我當時無從知曉，幾乎同時，另一場冒險已在南方數千里外展開。我亦無法預見，多年之後，我會獲此殊榮，將這段持續十年的非凡旅程轉譯給許許多多也在路上的人們。

這本書的翻譯讓我渡過了一個豐盛的夏天。無數次地，伴着對工作的熱切期待而醒來，於字裏行間照見一個個似曾相識的身影，自己近乎十年的縱身撲入，脈絡也漸漸變得更大、明朗，緣由變得更深。繁雜的日常中被淡忘的知識愉悅，在作者審慎而用情的筆觸下甦醒，讓我重溫年少時讀過的伍爾夫「直面生活，知其所以，後能棄之無憾」的箴言。格外幸運的是，我發現書中的紀錄、梳理、思考與追問，並不純然為了「知其所以」而存在，它們同時也是對著述所論之人如何安身立命的真實關照。學問的智與美，由是達成精緻的平衡。

即使初步學人之路，我亦知曉這平衡的不易。在不同華人社會的似是而非之間、在多重身份的雜糅衝撞當中，我體驗過田野的憂鬱、體驗過「在我們當中做研究」的困惑與掙扎。知識、閱歷、韌性與勇氣的局限，每每讓我無助而迷惘，讓我深感在種種試練當中保存最初善意的艱難。翻譯此書之

時，我驚嘆於作者在田野裏的縝密、冷靜、自省及敏銳，過往幾年在不同社群活動中與之相見時、她給人那種如想起所言的「莫名的信任感」亦歷歷在目。如果說酷兒的社會運動和學術研究都意圖讓人看見、理解並擁抱繽紛的存在，那麼，本書的作者用她首先打開自己的力量，為如我輩的後來人形成了最動人的感召。

Karen

2014年8月26日於北京

# 前言

這是一段在十年前開始的旅程。

2005 年，我在離開故鄉、移民香港二十多年後，第一次以研究者的身份回到上海，展開田野調查，在陌生的故鄉尋找新興的同志群體。

在田野中我想要找尋的群體，也同樣的既熟悉又陌生。在剛剛開始研究的時候，我參與香港同志社群已有一段時間，但對中國大陸的同志情況，除了零星的資料和對某些早期（1990 年代末）運動者的記憶外，幾乎沒有任何概念。這個研究從一個共同的身份認同出發，連接了我在兩個社會的同志社群經驗。

我做這個研究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想從一個親密的切入點去了解我離開已久的故鄉上海。我成長於 1970 年代的上海，那時候「同志」的意思跟「人」沒有區別。無論性別、年齡、職業，每個人都叫「同志」，都是革命的同志。2000 年後，「同志」在中國大陸有了新定義，它代表了一個新興的、去污名化的驕傲群體，廣義為英文的 LGBTQ，但內部的多元化卻不是 LGBTQ 可以包羅的。它的成員在不斷增加，邊界也在不斷延伸。

當離開已久的故鄉變成田野，可以是一次充滿驚喜的「尋根」旅程，用好奇的眼光看尋常的事物，用耐心的耳朵聆聽本來難於理解的人情常規。褪色的浪漫故鄉回憶轉化為充實的田野知識，有了 1970 年代的回憶，我更清晰地看到改革開放後翻天覆地的變化。

從上世紀末開始，中國大陸的同志運動高速發展，在無法正式登記成立組織的政治環境下，於不少大小城市中都成立了半地下的同志小組，同志網站更是多不勝數。對比香港社會的情況，中國大陸的同志運動者面對着更直接和嚴重的政治打壓。我參與了不少中國大陸同志社群活動，認識到同志運動者如何在多變的政治環境下組織活動和建立社群。面對時刻存在的來自國家社會控制體系的威脅和打壓，中國大陸的同志運動者更需要採取靈活的組織策略，永遠要準備應變的計劃，也需要非常熟悉有關法規和公民權利。

這也反映在上海拉拉派對的組織形式上。我剛到上海做研究的時候，拉拉派對的「遊牧」形式讓我感到非常好奇。派對不是在固定的場所，而是跟着組織者到處「跑」，比如 2005 年左右曾經有一個叫「蝴蝶」的拉拉派對，每隔一段時間我回到上海，「蝴蝶」又飛到了不同的酒吧舉辦。儘管上海拉拉派對這種沒有固定地點的「包場」形式多出於經濟原因，但它的「遊牧性」和整體同志運動的游擊形態，都凸顯了社會的多變和靈活組織策略的重要性。

面對不可預計、時刻存在的政治干預，中國同志運動者除了需要熟悉法制和權利來保護自己外，還很需要一種面對強權時無畏的幽默感。很多同志活動都會有便衣警察在場監視，而組織者不僅能與警察和平共處，甚至還會對此加以調侃。一個拉拉朋友告訴我，於 2009 年北京酷兒影展的開幕典禮上，組織者就笑着表示，希望在場的便衣警察也能夠欣賞接下來放映的酷兒電影。

通過研究，我見證了中國大陸同志運動的興起、在困難重重的社會環境下日漸壯大的同志隊伍、年輕熱情的新組織者的不斷加入、面對威脅不畏懼的冷靜和幽默等；作為一個研究者，同時又是同志社群的參與者，這一切令我深受感動。近年，兩地同志運動者的交流越來越密切，在香港的同志遊行，我和中國大陸的代表肩並肩地在銅鑼灣邁步；在北京酷兒影展，來自香港的同志組織者、導演和學者一起坐在狹小的放映室；在中國某中小城市的拉拉培訓營，香港、台灣、海外的組織者和大陸的女同志一起分享經驗，互相勉勵。

這個從 2005 年開始的研究，讓我完成了博士論文。畢業後，我把論文的內容修訂和補充，成為專書 *Shanghai Lalas: Female Tongzhi Communities and Politics in Urban China*，並於 2013 年由香港大學出版社出版，作為 *Queer Asia*（酷兒亞洲）叢書之一。這本書出版後，有幸得到學界和媒體不少正面的評價。2013 年夏天，我更得到上海女愛工作組、北京同語、北京拉拉沙龍和北京同志中心的支持，在上海和北京兩地舉辦了四場新書介紹會，向中國的同志社群介紹了這本新書。這次非常豐盛的旅程，讓我看到中國同志社群對有關研究的需求和支持。一直都有拉拉朋友問我這本書甚麼時候出中文版，讓中文讀者、尤其讓更多中國的拉拉朋友們可以讀到關於她們的書。在北京重遇朋友廖愛晚（Karen），她是我其中一場新書介紹會的主持人。Karen 本身是做性別研究的人類學研究者，也是經驗豐富的性別研究翻譯者。那次相遇，確定了中譯本的譯者。回港後，Karen 和我通過電郵聯繫，不到三個月，她已完成整本書的中譯初稿，效率和翻譯水準都讓我印象深刻。在這裏，我必須再次感謝 Karen 的幫忙，讓中文版可以及時面世。

2014年3月，我在校對翻譯稿的時候，收到一個驚喜的消息。*Shanghai Lalas* 被美國 Lambda Literary Awards 選為 LGBT Studies 組別的決賽競選著作之一，這個消息增加了我推出中文版的決心，希望中文讀者和中國的拉拉社群可以讀到這本書，讓我聽到她們的回饋。

中文版能夠面世，我必須感謝香港大學出版社的支持，尤其感謝 *Queer Asia* 叢書的編輯 Chris Berry、John Nguyet Erni、Peter Jackson、梁學思一直以來的鼓勵和支持。

我還要特別感謝在英文版未及致謝的一位朋友——北京藝術家石頭，她慷慨地把作品《卡拉 ok》給我作為本書的封面，作品用中國老月份牌的設計展示當代社會中女女情侶的親密生活。這個既耀目又深富顛覆意味的封面，讓我每次向讀者展示這本新書時都感到驕傲，儘管內容遠不如封面般耀目。

最後，我要感謝帶領我進入上海拉拉社群、為我的人生打開一扇新窗口的好朋友想起——女同志網站「花開的地方」及上海女愛工作組創建人。她是上海拉拉社群和運動至為重要的一位組織者，我仍然覺得在 2005 年能夠認識她，實在非常幸運。

金嘩路

2014年5月7日於香港

# 鳴謝

(英文版)

這是一部關於中國拉拉的書，是為中國拉拉、尤其是為上海拉拉社群而寫的。我非常感激她們當中一些人和我分享了最私密的生命故事，也感謝「老大」對我的信任，更感謝她帶我進入上海的同志社群。我要感謝所有的中國拉拉們允許我和她們並肩戰鬥，對抗社會的偏見，同時寬容對待我這個文化局外人。（我要特別感謝她們幫我大大改進了我的普通話）。非常感謝「華人拉拉聯盟」，它豐富了我對中國女同志、雙性戀和跨性別社群的認識。跟「華人拉拉聯盟」一起工作的經歷，讓我理解了在不同的華人社會中性少數運動所具有的多樣性。

本書寫作過程中，我經歷了一些人生起伏。我感謝朋友們在風風雨雨中給予的支持，在此感謝以下的朋友（按英文姓氏排序）：區逸詩、陳潔華、章曉妮、張佩琦、陳宜倩、趙樂思、曹文傑、鍾玉如、Thomas Gamble、Nguyễn Tân Hoàng、Dredge Kang、金佩璋、高詩慧、賴婉琪、林思靈、劉莉莉、李佩玉、梁學思、梁詠恩（Joanne）、梁碧琪、梁以文、林書怡、麥海珊、Fran Martin、Tan Ee Lyn、鄧亮滢、杜韞珏、黃結梅、任淑妍、Audrey Yue、阮佩文，以及我親愛的中國拉拉朋友們。

我真誠感謝博士論文導師馬傑偉教授和葉漢明教授，在我攻讀博士期間，她／他們在學術上和情感上都給予了我重要的支持。我也要感謝香港中文大學的性別研究課程，它為我的博士學習和研究項目提供了資助，特別感謝蔡寶瓊教授（寶姨）的關心、支持和啟蒙。我也慶幸擁有一群各自精彩的性別研究同學，她／他們為我創造了一個互相支持與啟迪的學習環境。

在我改寫博士論文為本書的過程中，John Nguyet Erni、馮應謙、Gayatri Gopinath、Saori Kamanō、Diana Khor、江紹祺、梁學思、Fran Martin、游靜、Audrey Yue 諸位，以及本書初稿的兩位匿名評審者，提供了寶貴的意見及鼓勵，在此一併致謝。我也感謝酷兒亞洲叢書的編輯和香港大學出版社為出版本書付出的辛勞。

最後，感謝家人給我的厚愛和支持。

金嘩路

2012年1月4日於香港

# 緒論：自我與社群的再連結

2005年6月4日，我獲邀參加了在上海市區一間卡拉OK舉辦的私人派對。我聽說當晚有一個驚喜求婚派對，主角是兩位女士。我跟隨新結識的一群拉拉<sup>1</sup>朋友來到一棟裝修華美的卡拉OK大樓，進了其中一個包房。裏面已經有十幾個年輕女性，桌上放着蠟燭和玫瑰花瓣。我不認識她們，也不知道接下來要發生的事。我跟着她們一起點燃蠟燭，排列成一大一小兩個心形。玫瑰花瓣灑落在蠟燭邊上，一束鮮花準備妥當，照相機也已安裝待命。我們剛忙完這些陳設，主角就抵達了。大家把將被求婚的那一位擋在門外，讓準備求婚的另一位走進來。我們關掉電燈，在點燃的蠟燭心形周圍站成一圈，翹首以盼。接着，門開了，求婚者跪了下來，捧出花束獻給剛進門的戀人。她的戀人完全被驚喜攫住了，大家歡呼起來。這便是我在上海進行田野調查的第一天。

作為一個剛剛聽說「拉拉」一詞的無知新來者，我不曾期待和一群我才認識了幾個小時的拉拉朋友參加一個如此私密的派對。我後來獲知派對上的那對情侶雙方都處於異性戀婚姻當中。回想起來，那個派對為我指明了後來研

- 
1. 「拉拉」在過去十年成為了一個被廣泛使用的詞彙，最早使用的時間可以追溯至2000年初。這是從台灣人稱呼「女同性戀」的本土詞彙改造而來。在台灣先是出現「拉子」，是「lesbian」一詞開頭「les」的音譯。中國把這個詞借用和進一步本土化之後，「拉拉」就成為了最廣泛的用法。「拉拉」是中國擁有同性情慾的女性的一種社群身份，經常和「同志」一詞混用，後者是更早出現在香港的一種身份，其完整的或說區分性別的稱呼有「女同」（女同志）和「男同」（男同志）；「拉拉」還和「les」混用，後者是「lesbian」的簡稱或非正式用法。不同的身份名稱有着語境的差異，「拉拉」和「les」用於非正式的、日常的、女同志專屬的語境中；而「同志」則用在更正式和政治化的場合，以強調社群的團結。所有這些身份在中國各地的社群當中，都得到了廣泛的認可和應用。在本書中，我使用「拉拉」來指女同性戀、雙性戀以及有跨性別認同的女性，「同志」則來指中國的整個LGBTQ社群。而在不特指任何一種具體的文化及地理脈絡的時候，我使用「女同志」和「男同志」。



圖 0.1：進入田野的第一天，作者參加的一個拉拉求婚派對。（圖片提供：作者）

究中的幾個重要主題：本地拉拉社群的形成、異性戀家庭與婚姻體制、成形中的同志家庭與婚姻，以及拉拉們面對家庭、婚姻乃至社會的日常策略。

我的研究從 2005 年開始，是一項對上海拉拉的民族誌調查，也是最早對興起中的中國同志政治和社群的參與式研究之一。其時正逢孤立的同志個體被聯結起來，形成同志社群，而先前飽受污名的性主體，也在通過創造新的身份認同來自我賦權。「拉拉」成為了有着同性情慾及其他非正統性與性別身份的女性的一種集體認同，而「同志」作為一個源自社會主義中國、而後在香港被重新定義的稱呼，回歸祖地，煥然一新，成為這個之前數十載都被剝奪了社會能見度的群體的公共身份。非正統的性與性別群體新近獲得的這些公共身份，創造出了新的自我與主體性；對自我的新理解，令這些群體對生活產生新渴望，同時也給異性戀體制的現存規範帶來挑戰。改革開放後的中國（1979 年以後），同志社群的形成，凸顯出自我肯定的同志主體，和她／他們在家庭中遭遇的否定之間的分歧，這一切促使我思考中國拉拉所面臨的嶄新挑戰。同志社群的出現，令關於主體性的新話語、親密關係的新形式，以及建立社交網絡的新途徑，都成為可能。新的機遇和新的管控模式並存於改革開放後的中國。鑒於這些新出現的資源與限制，拉拉們的生活在哪些方面異於以往？她們將如何處理新的同志身份？尤其是，將如何應對婚姻的壓力？

本書旨在探討擁有拉拉認同的女性，如何調解新的生活渴望和強加於她們身上的異性戀規條之間的矛盾。具體而言，當她們一再表示家庭和婚姻是日常生活中壓力的主要來源，她們如何在新近獲得的自我理解和異性戀規範的張力之間尋求平衡？我嘗試通過這個研究來回答以下問題：現存的關於同性戀及同志的公共話語，對拉拉們的日常存在有何影響？公共話語如何滲透並控制中國新出現的同志主體和同志政治？尤其是，這一同志主體如何影響拉拉們與否定她們性自主權及性主體性的文化所做的抗爭？換言之，在改革開放後的中國社會環境中，將會產生怎樣的同志政治？對於個別的拉拉而言，拉拉社群的出現給她們的日常生活、尤其是她們應對異性戀體制的策略帶來了何種影響？同志親密關係的新形式，例如合作婚姻（或稱形式婚姻），<sup>2</sup>如何導致對異性戀正統主義（Warner 1991）、主流規則，重新作出批判性的審視，並為家庭和婚姻開啓了新的想像？最重要的是，我們能夠為中國這些鮮活的親密關係實踐和同志運動，設想一種怎樣的未來？

## 勾勒「中國同志」

改革開放後，在中國無數的社會變遷中，「同志」作為一種重獲新生的身份，是與變革緊密相連的關注焦點。它被放在跨國男女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和酷兒運動及政治的語境中來理解，也常被放在改革開放後中國新公民身份的建構這一語境中來討論。作為一種新近引入的性主體，「中國同志」有着遭受社會及政治污名的歷史，並且仍是各方人士在公共領域中爭奪話語的戰場。本土同志社群、公眾、專家、學者乃至官方都熱衷於為「同志」賦予各種定義。「同志」的內涵仍然虛位以待。

於 2005 年，首個草根拉拉組織於上海成立，來自全國各地的女同志小組第一次在北京聚首，中國首本拉拉雜誌《les+》（[www.lesplus.org](http://www.lesplus.org)）誕生，這一切都發生在短短一年內，而過去十年是中國同志社群形成的重要時期。特別是近五年，中國各地的本土拉拉社群有了迅速的發展。

通訊技術在連結個體和形成社群的過程中，扮演了關鍵的角色。1990 年代末期，互聯網開始在中國普及，論壇上討論同性戀的話題只是以圈內人通用的詞彙進行。進入 2000 年後，獨立的拉拉網站開始嶄露頭角，上海當地拉拉當中最受歡迎的三個網站：阿拉島、深秋小屋、花開的地方（簡稱「花開」），均成立於 2000 年伊始。截至 2005 年，花開已經擁有超過四萬名註冊

2. 形式婚姻（簡稱形婚，或合作婚姻）是一個拉拉和一個男同志之間自行安排的婚姻，進行形婚是為了應對家庭強加給雙方的婚姻壓力。

用戶。互聯網也加速了華人社會之間同志文化的交流，而中、港、台三地因為在語言、地域及文化上具親緣性，所以後兩者的女同志文化及運動，一直以來都是中國拉拉的重要參考。而隨着區域活動的開展，訊息、文本和人際的交流得到進一步加強。例如，拉拉營就是中港台三地女同志社群進行對話的重要平台。這是每年一次在中國舉辦的訓練營活動，參加者是來自中國、香港、澳門、台灣及海外說華語的女同志組織者。從 2007 年開始，拉拉營把上述區域的本土拉拉社群組織者匯聚在中國，現已成為中國拉拉組織的溫床，同時也是中國同志政治的一個重要話語生產場域。

對普羅大眾而言，近年常見的「同志」一詞，指的是「同性戀者」。對年輕一代來說，這個詞已經完全脫離昔日的社會主義「同志」意涵，但公共論述中還是較多使用「同性戀」一詞。在中國大陸的學術界，「同性戀」比「同志」使用更為廣泛。因此，在日常用法上，「同志」幾乎就是「同性戀」的同義詞。在同志社群內部，正在努力地將這一概念擴展到指代同性戀、雙性戀、無性戀、跨性別及酷兒等多種身份，但公共論述中「同性戀」的用法仍佔主導地位，這兩個詞的混用也很常見。

同性戀，尤其是男同性戀，近年來吸引了大量的公眾關注。在經濟改革的年代，在中國對於性和私人生活的態度不斷變化的大背景中，公眾對同性戀的理解既受制於學術研究的不斷修正和辯論，同時也受到流行文化和日常交流的影響。國營書店出售同性戀相關的書籍，官方媒體進行同性戀社會接受度的調查。<sup>3</sup>時至今日，媒體報導的增加、黃金時段電視節目中同性戀者的現身、互聯網論壇上關於同性戀的熱烈討論，以及更加晚近的耽美（BL）漫畫和同志小說在微博上和青年中的流行，都說明了公眾對於這個過去被噤聲的題材充滿好奇。

公眾對同性戀的興趣，是在最近幾十年社會控制方式發生變化的大背景中出現的。改革開放後，個人在空間和社會階級的流動性大為增加。從 1990 年代開始，個人在地理上的移動性導致都市同志次文化在中國大城市中出現。此外，勞動力市場的開放令國家通過單位（中央分配工作系統）來直接控制人們私生活的做法式微。

而在意識形態方面，從 1990 年代末期開始，中國對同性戀的控制也出現了範式變化。在法律和醫學領域出現兩大變化。1997 年，過去適用於男性同性戀行為的「流氓罪」從舊的《刑法》第 160 條中廢除，同性戀從此不再受

3. 一家國內新聞網站所進行的網絡調查發現，超過 70% 的回應者（總數 3,977 人）表示，假如自己的孩子是同性戀的話，她／他們能夠接受（2007 年 11 月 6 日，引自 [www.cctv.com.cn](http://www.cctv.com.cn)）。

到法律制裁。2001年，中國精神病學協會又將同性戀從性變態的醫學分類中刪除。一般稱這兩項變化為中國（男）同性戀的去刑事化和去病理化。可是，在法律、醫學以及其他範疇裏，針對同性戀的國家和社會禁令仍廣泛存在。與此同時，社會對同性戀的控制越來越多，並以公共健康和公眾安全的修辭出現。尤其是男同性戀，被國家建構成一種對公共健康和社會穩定的威脅；另一方面，女同性戀卻在公共論述中被邊緣化，也很少在主流媒體中得到呈現。這一切可以總結為關於中國同性戀公共論述與再現的兩個常見觀點：從異性戀立場出發的過度呈現，以及給予男同性戀的過度關注。

中國對同性戀和同志的公共論述及學術研究，壓倒性地採取了一種異性戀的立場。同志總是「被談論」，並被建構為「他者」（正如 Harriet Evans 在談及中國學者的前期研究時所提到的那樣），這一事實增加了「誤解和曲解的可能」（Evans 1997, p. 209）。作為一種進步，以第一人稱敘述的同性關係故事，最近幾年進入了公眾的視野，但是他者化及刻板印象化的再現，仍有負隅頑抗的風險，因為說教式的、異性戀正統主義的價值觀主導了公眾的聲音。公共論述和學術研究中對女同性戀呈現的不足，則有多方面的原因。李銀河與王小波（1992）、阮芳賦（Ruan 1991）、張北川（1994）、Lisa Rofel（1997）都提到了在中國難以找到「同性戀女性」，由於這些研究大都於 1990 年代開展，一個可能的解釋是擁有較高能見度的拉拉社群比男同志社群出現得更晚；另一解釋則是文化中普遍存在對女性的性的否定。從法律管控的角度看，相較於男同性戀行為，女同性戀行為一般被認為較少對公眾安全構成威脅。因此，相對而言，女性很少因為同性性行為而遭到處罰。儘管根據阮芳賦（Ruan 1991）的記載，1980 年代也曾有過幾個女性因同性「性犯罪」而被拘留的例子，官方對女同性戀的寬大處理，反映了文化上否認女性之間情慾活動的現實。作為性別等級當中的從屬者，女性的「反常」性行為被認為對主流社會秩序威脅不大。這種對女性的性文化偏見，為那些擁有同性情慾及性行為的女性，提供了一個相對較少管控與懲戒的空間；但是，卻導致了女同性戀在公共想像中被抹除，並直接影響到本土拉拉社群的發展，尤其影響本土拉拉組織的資金來源。中國的同志運動很大程度上是源自並仰賴愛滋防治和公共衛生的話語，國內外的資金來源總是服務於同性戀人口的性健康項目。拉拉群體則常被排除在這些分配給性健康項目的資源之外，因此，她們不僅在爭取資源上處於下風，而且也在公眾視野中位居邊緣。很多時候，她們都要被迫依賴男同志的資源來開展自己的項目和發展自己的社群。上海的「同心女同志熱線」和更加晚近的「800 拉拉熱線」，就是拉拉依賴男同志資源來為自己的社群提供支持服務的兩個典型例子。

## 強制性的婚姻

在私人領域方面，拉拉們對同性關係的渴望和家庭對她們的婚姻期待之間的矛盾，是我訪談過程中一再出現的主題。對於已婚的報導人，這種壓力則體現為異性戀婚姻和同性戀婚外關係之間的矛盾。如前所述，家庭及個人生活在改革開放前受工作單位和社區監督制度嚴格掌控與監視，但在中國朝着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已經在很大程度上擺脫了國家的直接管控。對集體利益的強調，正逐漸轉變為追求個人權利和私人生活領域的多種選擇。國家對私人生活的直接管控演變為一種更加私密的形式，由個人的直系親屬和社交網絡的日常監管來完成。家庭成員，尤其是長輩，成為了年輕一代私人生活的重要監管者。對於非正統的性主體而言，異性戀家庭常常是她／他們日常生活中最主要的壓力來源。在當代中國，異性戀家庭及婚姻作為異性戀管制的形式，有着和其他公開形式的社會管控一樣的重要性。這種加諸非正統的性主體上的管控本質，例如，通過親情及家庭和諧的話語，仍然有待深入探討。

婚姻的強制性讓拉拉身處一種不利地位，中國文化不承認拉拉們是擁有性自主權的主體。雖然未婚的男女都被認為是不成熟或沒有自主權的個體，但是未婚的女性進一步被剝奪了性方面的自主地位。男主女從的性模式作為一種文化信仰，並不承認女性在性方面的自主權，而一夫一妻制的異性戀婚姻，則進一步自然化了女性在與男性的性關係中的被動地位。在這樣一個將女性的性被動視為性別關係及性別階層之基石的文化中，非異性戀的女性很難被承認為性主動的主體。其結果之一就是，出櫃成為了拉拉們一個非常棘手、倍感困難的任務。一個拉拉不僅要作為同性戀者出櫃，而且首先還要作為一個正當且自主的性主體出櫃。此外，對未婚或離婚女性的污名，在像上海這樣的國際都會裏仍然廣泛存在。婚姻在文化上被認為是通向成年的過渡儀式，這種信仰尤其限制了女性選擇另類生活安排的自主權。很多上海本地女性都告訴我說，如果她們想要離開父母單獨居住，她們就必須結婚。婚姻是她們擺脫父母管控並作為自主個體的唯一途徑。而對於那些已經和異性結婚的拉拉們而言，離婚並不總是一個切實可行的選擇。離婚將如同結婚那樣，牽扯到雙方的家族，隨之而來的是，一場失敗的婚姻將被看作有負家族期望。婚姻的強制性及其作為成年地位的唯一保證，與夫妻結合作為唯一得到承認的家庭形式，均為中國同志群體帶來揮之不去和沉重無比的壓力。本書的重點之一，就是批判性地檢視拉拉們所面臨的婚姻壓力，以及她們以何種策略應對異性戀正統主義的社會要求。

## 個人和政治上的意義

這項研究對我而言有着個人和政治上的雙重意義。我出生於上海，幼年移民香港。我是香港同志社群的活躍成員，後來又參與了中國的同志運動。這項研究勾起了我很多個人經歷，也牽扯出很多文化及政治上的認同。它讓我重回自己的出生地，重拾對 1970 年代在上海渡過的美好童年的模糊記憶，它也連結了我在不同的同志社群中的參與，讓我得以跟中港兩地同志社群展開對話。在研究途中，我發現自己不斷地把兩個社群的經驗互為參照。這項研究也為我創造了一個學術空間，讓我跳出局內人的立場去思考這兩個社會中的同志政治。這種在多種角色和視角之間進進出出的練習，豐富了我對自己及對社群的理解，讓我得以內省自己在性別、性、族群、階層、年齡及文化認同上的立場，還讓我對身處的兩個社會都有了更深的了解。香港在政治上是中國的一部分，與中國大陸山水相依、文化相承、經濟相繫、人倫相連。然而，在中國從事民族誌研究，即使那裏是一個我曾渡過童年並且仍有家人居住的城市，也依然像是在陌生的故鄉的一次文化歷險。途中，我必須擦亮雙眼，以便紀錄下那些諸如人際互動儀式、社會關係等級、個人身體邊界感知的日常規範，甚至走在人行道上也要留心自行車的潛規則。事實證明，學習這些日常生活的細微風俗，對於我理解中國同志所面臨的日常挑戰頗有助益。尤其是，作為一個沒有涉足異性戀婚姻的女人，我也更能理解未婚女性是如何遭到邊緣化，有時甚至因為她們的性別、年齡和婚姻狀況而在社交情境中飽受騷擾，體驗到家族中、職場上那些素昧平生的人們（已婚者尤甚）是如何以一種令人窒息的方式，糾纏於她們的個人生活和人生規劃。

我作為拉拉群體的成員參與這項研究，這身份在我加入中國的同志運動後變得更加明顯。研究剛開始不久，我將一個我曾參與的香港口述史計劃——「愛女人的女人」，介紹給了上海的拉拉社群，<sup>4</sup> 後來她們開展了紀錄上海拉拉生命故事的項目。該項目出版了一本由上海首個草根女同組織（上海女愛工作組）內部發行的小書，題為《她們的愛在說：愛上女人的女人·上海·口述史》（2008）。作為口述史訪談的培訓員，我也參與其中，並且擔任該項目的顧問。再後來，我成為了華人拉拉聯盟的委員，這是一個跨區域的華語女同性戀、雙性戀和跨性別者聯盟，而我至今仍是其顧問團成員。

研究者和運動者的雙重身份帶來了研究倫理方面的考量。對我而言，我需要在不同的情境中持續地管理自己的身份。作為研究者，同志社群是我需

---

4. 此處提到的口述史項目是「香港愛女人的女人口述史計劃」（2005），該項目出版了一本香港有同性情慾的女性的生命故事集。

要去研究、紀錄和分析的「田野」；而作為運動者，它是一個我個人認同的社群。有時候，當我必須在兩種身份中選擇其一，會感到壓力；而另一些時候，這兩種身份又天衣無縫地結合在一起。關於研究者身份管理的思考，請參閱第 11 頁的「方法論筆記」。

通過參與中國的同志運動，我了解到了不同地區、年齡、階層、婚姻狀況、民族、宗教、教育背景，乃至不同的性與性別認同的拉拉們所具有的多樣性。具有雙性戀認同的女性和生理上是女性但具有跨性別認同者，在這個社群中逐漸有了更多的聲音。不同城市和地區的拉拉社群發展也擁有高度的差異性，像上海和北京這樣的國際大都會，已經有了發展較為完善、能見度較高的拉拉社群及組織。而在較小的城市及鄉鎮，很多拉拉還在通過較舊的社交工具（例如 QQ）來嘗試找到彼此。不同地區之間同志社群發展的不平衡是非常顯著的。和來自中國其他地方的拉拉們一起工作，擴展了我的研究的地理邊界。這樣的經驗令我關注到不同地區的拉拉們所處的具體情境；更重要的是，我能夠從宏觀角度觀察公共或私下的管控機制如何實施在中國的拉拉們身上。這項研究的參與者，可以進一步說是擁有一定的社會與文化背景，能夠接觸到當地拉拉社群的女性。她們的經驗，可與那些生活在相同規模的城市或面臨類似的婚姻與家庭壓力者相對照。本研究主要報導人的背景資料，請參閱〈主要報導人簡介〉。

這項研究的政治性，源於我對紀錄中國女同志生活和興起中的拉拉社群的強烈願望。長期以來，公共論述和學術研究都鮮有提及中國的女同性戀、雙性戀、女跨男跨性別，以及女同志社群。1990 年代中國首次出現同性戀人口的專門研究，早期的研究幾乎全都集中在中國都市的男同性戀者（張北川 1994；李銀河與王小波 1992；周華山 1996、1997、2000；Rofel 1999）。1990 年代的論著和研究當中，僅有偶然出現的隻言片語提及女同性戀（Ruan 1991；劉達臨 1992；潘綏銘 1995；Evans 1997；周華山 1996、2000；李銀河 2002a、2002b）。阮芳賦、張北川、李銀河及 Lisa Rofel 都提到在中國很難尋找並訪談處於同性關係的女性。這至少說明，直到 1990 年代，作為一個社會議題及一個獨特的群體，女同性戀都是不可見的。Harriet Evans 在她 1997 年出版的著作中評論到，只有「非常有限的訊息、建議及支持，也缺乏社交活動的機會，還生活在對身份暴露的持續恐懼中，同性戀者在關於性的公共論述中完全無法發出自己的聲音」。他們僅僅是一些常被「論及」的對象（Evans 1997, p. 209）。Evans 表達了她對於中國同性戀者被他者化的擔憂——同性戀總是被視為異常或某種疾病。同性戀者總是被置於學術或科學研究的對象這樣一個位置上，或者被認為需要社會的憐憫（張北川 1994；劉達臨 1992；李

銀河與王小波 1992)。過去十年，由中國本土學者撰寫的性學論著，顯著增多(劉達臨 2000；潘綏銘與曾靜 2000；馬曉年 2003，方剛 2005a、2005b；劉達臨與魯龍光 2004；潘綏銘、白維廉、王愛麗、勞曼 2004；潘綏銘與楊蕊 2004；馬曉年與楊大中 2005；潘綏銘 2005；孫中欣、Farrer 與 Choi 2005；周丹 2006、2009；潘綏銘等 2008；郭曉飛 2007；馬平 2011)，這些 2000 年後的中國本土性學研究可分為兩類：在不同群體中開展的廣泛的定量或定性的性行為研究，以及對改革開放後中國的那些曾經沉默或者新近出現的性實踐或性群體開展的專門研究。在這些研究當中，對邊緣的性所進行的社會學及法學研究，是中國學術界在這一領域內發展最快的兩個範疇，新興的性群體、性實踐、新文化再現和法律議題都成為了熱門的學術課題。雖然本土性學研究還在發展，但是 Evans 曾經指出的那種「誤解和曲解」的風險，在 2000 年後的著述中仍然存在。大部分的研究裏，分析的框架和研究者的預設立場仍然都是由異性戀主導。性的邊緣群體，例如性工作者，仍然有着因學術研究之名而遭到客體化的危險。近期對中國同志的研究，無論以中文或英文出版，包括了對文學、影視、網絡中的同性情慾的文化再現，以及對本土同志社群與文化的研究(He 2002, 2010；Sang 2003；孫中欣、Farrer 與 Choi 2005；Chen and Chen 2006；Kam 2006、2010；Li 2006；Rofel 2007；Eng 2010；Engbretsen 2009；Kang 2009；Ho 2010；Kong 2010, 2011)。近年來，關於女同性戀的研究或論文也有所增加，但仍明顯少於關於男同志的研究，對新近出現的中國拉拉社群的了解，非常有限。而在地理位置上，當前對中國男女同性戀的研究，似乎都局限在首都北京，很少有研究觸及中國的其他地區。首部研究中國女同志文化的專書，是 Tze-lan D. Sang(桑梓蘭)2003 年出版的 *The Emerging Lesbian: Female Same-Sex Desire in Modern China*，該書梳理了從前現代至後毛澤東時代中國文學文本中的女性同性情慾。作者為此，還在 1990 年代前往北京進行了一次對「大都會中年輕女同性戀主體」的短暫田野觀察。桑梓蘭表示，她所遇到的是一些「活躍、自信、有着女同性戀認同、二十歲出頭並且以女同性戀自稱」的女性，而她們才剛剛開始通過互聯網這種新生事物來彼此聯繫(Sang 2003, p. 171)。「拉拉」一詞當時並未出現。另一本最近出版的關於中國男女同性戀次文化的書籍，也簡短涉及了北京的女同志生活，並對新興的拉拉社群與政治進行了一點分析(Ho 2010)。人類學家 Elisabeth L. Engbretsen(殷莉)(2009, 2013)進行了一項對北京拉拉社群的深入田野研究，紀錄了拉拉們應對婚姻壓力的日常生活策略。對當代中國擁有非正統的性與性別認同的女性進行的民族誌研究，以及具有文化敏感度和對新興的中國同志政治的分析，是當前階段的中國性學研究所需要的；

另一方面，對增進本土同志社群和個體行動者的日常生活實踐的知識，也非常重要。

## 本書結構

本書分為五章和結論。第一章勾畫出上海當地拉拉社群的時下面貌，以及這些社群及活動出現的社會背景。後續幾章檢視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對同志和同性戀的公共論述及流行理解。過去二十年，急速變遷的社會景觀和對私人生活日常監管的範式轉變，塑造了當代中國的面貌。人們對自我的理解及對生活的嚮往，也經歷了急劇的變化，尤其對在地理距離上、還是在情感紐帶上都更具移動性的一代人來說，她／他們日常經歷的變化特別深刻。對於那些嚮往過社會規範以外的生活的人而言，此時此刻既是機遇，也是挑戰。此外，改革開放後中國同志社群的形成，也為那些有着非正統情慾和性別認同的人們帶來了深遠影響。本書詳細討論時下的公共論述和新興的同志社群如何影響拉拉個體，以及她們對社會變化和社會規範的回應。本書的結論章節，是對當下中國同志社群主導政治的一個分析，我將其命名為「公共正確政治」。它不單產生於改革開放後的中國這一特殊的社會和文化語境，也同時回應同志個體和社群在這個歷史交匯的時刻所面臨的新挑戰和新機遇。

第一章勾畫出上海拉拉社群不斷發展的地貌。這章討論當代中國同志社群快速發展背後的社會、政治和文化因素，是我對 2005 至 2011 年間上海拉拉社群的一個綜述。

第二章檢視改革開放期間演變中的同性戀的公共論述。過去數十年，這些關於同性戀的公共討論，深刻地改變了主導同性戀的公共再現的意識形態。同性戀者愈發被建構為一個需要公眾監督和管理的獨特群體。在這種新興的對同性戀的大眾關注下，我們見證了同志社群在網絡空間和線下空間的快速增長。和普通大眾及來自各個領域的專家們一道，同志社群自身也熱切投身於同性戀的新公共論述的建立。

在同志社群逐漸普遍、公眾對同性戀的認識與過去十年相比有顯著增加的前提下，第三章聚焦討論拉拉們的私人生活。我尤其關注拉拉們面對的婚姻壓力，她們是如何周旋於自身非正統的性與性別，以及家庭和諧、傳統孝道等強勢敘事之間，而這一切都發生在一個從意識形態上否定女性積極且正當的性主體文化。我同時也探討「沉默」與「寬容」作為一種中國特色的恐懼同性戀力量，是如何在家庭和婚姻方面對拉拉們實施管控。

第四章討論拉拉們日常生活中用以應對家庭及婚姻壓力的多種策略。第一部分闡述拉拉們和原生家庭之間的互動；第二部分分析已婚拉拉們是如何協調她們的同性關係和異性婚姻之間的矛盾。

最後一章檢視當下中國的主導同志政治。隨着同志社群的形成，關於同性戀的公眾意識與日俱增，但不少同志的家庭仍對同性戀抱持否定與沉默的態度，公私兩者之間出現了差距。這一由公／私分割所造成的同志生存矛盾，助長了一種中國特色的同志政治，我稱之為「公共正確政治」，所指的是一種正常化的邏輯，追求一種「健康向上」、「恰如其分」的同志形象，以便得到社會和家庭的承認。它的出現是要回應改革年代同志所面臨的壓迫與機遇，「合作婚姻」或「形式婚姻」就是這種政治最明確的表達。該章還會探討公共正確政治背後所隱藏的社會和政治語境，以及其對個體生活乃至整個中國同志社群的影響。

本書是對上海拉拉社群的一項廣泛的定性研究，通過作為一個原籍上海且有拉拉認同的研究者開展參與式民族誌調查，我紀錄了形成階段的上海當地拉拉社群及其第一代成員的日常生活掙扎。鑒於中國在地理、文化、社會和經濟方面的差異性，以及這些差異之間暗藏的張力，宏觀地分析並討論中國本土同志社群的一切內部差異，既不切實際也沒有成效。因此，我將自己的研究界定為一項中國都市同志社群草創時期的、具有同性情慾的女性的民族誌。這個研究，也大大受益於我在上海以外的同志社群的參與。以下的部分是關於方法論、關於我作為研究者／社群成員和同時作為局內人／局外人的反思討論。

## 方法論筆記

本書是基於一項從 2005 年開始的連續研究，從 2005 年到 2010 年，我多次造訪上海，進行面對面訪談和廣泛的參與觀察。停留的時間少則數天，多則月餘。我對二十五位自我認為拉拉的上海女性進行了正式的錄音訪談，也和我在不同場合遇到的拉拉們進行了非正式的不錄音交流。一位當地的組織者帶我進入上海的拉拉社群，她介紹我認識了部分報導人，而後通過互相推薦，我又接觸到其他的報導人。我和她們當中的一些人是在不同的社群活動中認識的。我和一些重要報導人在首輪訪談後仍然保持聯繫，以便紀錄她們的生活及當地拉拉社群的變化。

多數訪談是用普通話進行，只有少數使用了上海方言或者粵語，使用何種語言取決於各位報導人的偏好。平均而言，每次單獨的訪談歷時一至兩小

時。部分報導人做了補訪，以便我能夠了解她們生活的新近變化，以及展開首次訪談時未能深入的話題。個別情況下，我也同時訪談一對伴侶，這通常是因為她們希望一起接受訪談。另一些時候，訪談伴侶是因為我希望了解她們之間的關係。而在訪談伴侶前或後，我都會單獨訪談她們個人，以便獲得獨立的觀點和私人的訊息。

至於參與觀察，我參加了上海和中國其他城市主要的社群活動及社交聚會，包括女同志派對、沙龍聚會（主題討論和分享）、拉拉團體的工作會議、一堂關於同性戀的大學授課、全國性的酷兒電影節、酷兒藝術展、同志大會、工作坊、培訓營及休閒的社交聚會。在某次前往上海做田野研究期間，我和一群拉拉同住了一個公寓內。我因此參與了她們的日常生活及與拉拉朋友的社交聚會。我還參與了上海女愛工作組紀錄上海拉拉生命故事的口述史項目，並擔任學術顧問及培訓該項目其他志願者的工作坊講師。

## 研究者的位置

提供關於中國都市女同志個體與社群的民族誌資料，和分析來自田野研究的數據，是本書在政治上和學術上的兩個目的。為了獲得深入的民族誌訊息，我首先需要和報導人建立信任與投契的關係。在這方面，我和報導人相同的性別、民族、社群，以及我的語言能力，都被證明是有助於建立關係的。這些共享的身份，也讓我在進行研究時相對容易。在對少數人群的女性主義民族誌和參與觀察研究中，一個守門人通常是找到更多線索的關鍵。我通過在香港和美國華人女同志社群中的個人關係，找到了上海拉拉社群的一位主要組織者。在我的整個研究中，我都依賴這位當地拉拉社群的關鍵人物，把她視為重要的訊息來源和可靠的社群嚮導。

在研究的早期，我向報導人自我介紹說，我是香港中文大學的研究生和香港女同志社群的一員。在和報導人的最初互動中，我的角色是一個有着同志運動背景的研究者。我同時也向報導人透露我原籍上海的背景，並表示我會說上海話。對於上海本地的報導人而言，我們相似的區域文化背景被證明是有助於研究開展的。

但另一方面，我也自知我和報導人之間仍有區別。例如，我們說普通話時有不同口音，我們在對話中使用不同的詞彙和文化參照，這些差別時時刻刻都讓我意識到我們來自不同社會這一事實。一個研究者和她報導人之間的明顯差別，例如性別、種族、年齡、階層、性身份（或者在我的例子中是文化背景），在建立關係的早期階段，可能是一項難於處理的挑戰。同時作為

一個局內人和局外人，我的策略是避免報導人對我了解她們社會的程度抱有任何錯誤的期待。我總是在見面之初就言明，離開中國之時我尚且年幼，因此，雖說我的上海話相當流利，我卻沒有關於這個國家的局內人般的認識。這種局外人的位置讓我能夠更加深入地挖掘問題，而在局內人之間這種問題很可能就被認為無需深究了。例如，局外人的位置讓我能夠要求報導人解釋在她們的社會中甚麼東西被視為「常識」，而這麼做也鼓勵了報導人對她們心中的「常識」進行更多反思。

女性主義方法論與眾不同的特色之一，就是研究過程中的平等主義，它強調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之間互利互惠的關係和互為主體的特性 (Stacey 1988, p. 22)。但是，廣泛的參與式田野研究所產生的私密知識，仍然引發了很多方法論上的擔憂。其中，研究者的局內人和局外人角色是女性主義研究傳統中經常討論的問題。對於局內人研究者，她所研究的文化近似於她自己的文化，她需要不斷努力，才能夠和她所熟悉的文化實踐拉開距離，並注意到那些她視若無睹的現象；而對於局外人研究者，她則需要克服最初的無知，而後還需要小心保護那種隨着時間推移會逐漸淡忘的陌生感 (Acker 2000, p. 94)。而當一個研究者對於她的報導人而言既是局內人又是局外人，就像在本研究中發生的那樣，情況會變得更複雜。為了能從這種雙重角色中獲得更多洞見，我使用了互為參照的方法。在分享共同的日常經驗時，我會突出報導人和我自己之間的文化差異，把她們所講述的和我在香港的類似經歷進行建設性的比較，以便我對她們的敘述「去熟悉化」。通過把這兩個華人社會互為參照，我在理解拉拉經驗的文化具體性方面變得更敏銳。此外，為了不讓我們之間的文化差異成為我們交流的障礙，我對當地的文化規範進行了有意識的學習。我利用在上海的家族聯繫，抓住一切機會認識上海的當地居民，以便增加對上海的局內人的了解。例如，在非正式的飯局和聚會中，我通過和當地人交談，大大增加了我對上海的婚姻規範和婚姻文化的認識。而撰寫田野筆記也是一個有效方式，它既能幫助我熟悉當地的知識，又能磨礪我作為一個局外人的眼光，這一技術對於長期的田野研究尤其有益。來自報導人之外的觀點、評論和故事，也豐富了我的研究發現。

## 進入社群

我於上海的首次田野考察是在 2005 年的 6 月，其間我見到了老大 (化名)，她是上海拉拉社群的一位主要組織者。老大那時候是「奔三」的年紀。

幾年前，她從外省的老家搬來了上海。我認識她的時候，她正經營着中國最受歡迎的拉拉網站之一。

那是 2005 年 6 月的一個傍晚，在多次電郵通信之後，我終於得見老大本人。她邀請我和她一起去上海市中心的一個餐館，跟其他幾位拉拉共進晚餐。我忐忑於老大和她的朋友們會否因為見到一個來自香港的陌生人而滿不自在。那天晚上，我戴了一條用女性性別標誌作墜子的項鍊，以暗示我和她們有一樣的認同。後來我發現這個小計謀奏效了；在場的一個拉拉後來告訴我說，她們注意到了我的項鍊，於是更能確認我的身份。這讓她們對我比較放心，也對我個人更加好奇。那天我到場時，老大和一小群朋友已經在那裏等我了。她向朋友們介紹說我是一位來自香港的研究者。剛開始的時候，我們都有點緊張和靦腆，但隨着我拿出我編輯的一本書（2001 年在香港出版的《月亮的騷動——她她的初戀故事：我們的自述》，<sup>5</sup> 二十六個港澳及海外的女同初戀故事），氣氛一下子就活躍起來。我帶了好幾本《月亮的騷動》到上海，準備送給報導人。她們對這本書很感興趣，有幾個人甚至在飯桌上就讀了起來。到那個時候，她們都明白我是自己人了。這讓我們之間的互動容易了許多。而我會說上海話這一點，對她們當中的上海人也起到了破冰效果。我原籍上海的背景進一步模糊了局內人／局外人的界線。每次我開口說出上海話，總會在她們當中引起一陣小小的騷動，席間的氛圍也隨之改變。而田野研究中的另一些時刻，我是在場者當中唯一會說上海話的人，因為上海拉拉社群的很多成員都來自中國其他省市。作為香港人，我多數時候都是她們眼中的老外，因為香港和內地的文化邊界還是相當分明的。但是會說方言這一點，卻又讓我比她們當中的很多人更像是一個本地人。這種混合的文化背景及我的女同志身份，都讓我更容易和上海的拉拉們打成一片。而我和老大及其他的拉拉朋友一起渡過的這個傍晚，讓我第一次意識到這種多重方向的破冰效果。

晚飯之後，我們到市中心一間酒吧參加「女同志之夜」，然後又和老大的朋友們一起到卡拉 OK 廳唱歌至夜半方歸。每週一次的「女同志之夜」，是市區一家曾經生意不錯的女同志聚點「1088 酒吧」從前的老闆和老大的網站「花開的地方」（簡稱「花開」）共同組織的，她們和另一家私人酒吧簽訂了合作合同，每逢週五和週六舉辦「女同志之夜」。這兩間夜晚酒吧就改名叫作「花開 1088」。對圈內人而言，「花開」和「1088」的組合就是「女同志酒吧」的同義詞，兩者都是社群內部知名度頗高的招牌。老大網站的志願者們在酒吧門口

5. 金嘩路（編者和插圖作者）：《月亮的騷動——她她的初戀故事：我們的自述》（香港：Cultural Act Up，2001）。

售票，門票 30 元人民幣一張，含一杯免費酒水。酒吧的特定區域被設為女士專享，僅對女同志之夜的參加者開放。通過老大，我在「花開 1088」認識了更多的拉拉，她們大多二十出頭，有着不同的地域背景。一些人來自其他省市，目前在上海工作。還有幾位在上海附近的城市工作和生活，週末的時候專程來上海與拉拉朋友聚會。也有幾個上海本地人，彼此之間只用上海話交談。而整個上海拉拉群體通用的語言，是全國統一的普通話。

## 報導人

本研究的關鍵報導人是有着拉拉認同並活躍於上海拉拉社群的女人，關於報導人的具體情況，可以參閱〈主要報導人簡介〉。我只選擇那些在訪談時有固定工作或者自由職業／自僱的報導人，同時盡可能地擴大報導人群體的年齡跨度。我這麼做的目的，是希望找到那些已經工作、對社會生活有所體驗的報導人，這樣我才能考察她們是否得到社會接納，以及她們在所謂公共領域中的情況。所以，我沒有主動尋找那些沒有受聘或者從未涉足勞動市場的報導人，也沒有找仍在上學的拉拉。此外，年輕女性因為擁有不同的社會和經濟地位，在小學、中學和大學所遇到的同性情慾問題，類別上是非常不同的。二十多歲、接受過中學或大學教育、並且有一份白領工作的拉拉，是當地線下拉拉社群中最活躍的成員。而那些在社群建設中最積極的人（例如熱線工作者或當地工作小組的組織者）幾乎都擁有這樣的年齡、教育和職業背景。她們的地域歸屬各異，但都住在城市。要想找到三十歲以上的報導人明顯就難許多，而在公開聚會中幾乎看不到四十歲以上的拉拉。偶爾也能在上海市中心的女同志派對上看到大齡拉拉的身影，我就曾在市中心一個高級酒吧裏見到過一群看上去超過四十歲的拉拉。其他的報導人告訴我，上海那些有職業背景的、更有錢和更成熟的拉拉有她們自己私下不對外的聚會。她們只在這些私下聚會上見面，所以在公眾場合很難看到她們。她們的階層和職業背景要求她們的社交風格更加謹慎低調，我進行本研究時沒能和她們取得聯繫。

不難發現，上海拉拉社群中最顯見和最容易接觸到的成員，在人口統計上都有一些共同特點，這在本研究的報導人簡介中也有所反映。她們大多是二十幾歲不到三十歲、經濟獨立、受過大學或者至少中學以上的教育。她們或是白領員工，多數受僱於私人企業，或是自由職業者或自僱人士。她們多數是城市居民，而且當中很多人都是離開故鄉和家人，在上海工作和生活。她們多數有自己獨立的居住空間，或者有能力支付住房的開支。她們大多沒

有結婚。總而言之，她們是最近二十年發生的經濟改革和社會變遷其中最大的受益群體。她們所享有的社會、經濟和性的自由，不可能推廣到來自其他社會和經濟群體的女性身上。在上海拉拉社群最顯見和最可及的成員中，這樣的人口特點是很有代表性的。但是，她們的聲音雖然屬於主流，卻不應被視為整個群體的唯一聲音。

# 索引

(根據漢語拼音或英文字母順序排列。)

## 中文條目

- 愛滋 5, 29, 40–42, 82  
安克強 46  
澳門 4, 14
- 包場 26, 28  
北京 8, 9, 21, 22, 30, 32, 36, 45, 49, 53, 63, 83, 84  
北美 19, 32  
「不正常」女性 56, 68
- 超級女聲 65  
出櫃 6, 49, 50, 58, 60, 64–67, 69, 77, 81, 86, 94  
軟出櫃 66, 81
- 大齡青年 57  
耽美漫畫 (BL) 4  
單位 4, 6, 20, 22, 23, 34, 42, 45, 51, 53, 78  
丁乃非 80, 81  
多性伴者／多性夥伴／多性伴侶 22, 35, 52, 82  
獨身／獨身女性／女性獨身／單身女性／單身 22, 23, 51, 52, 56–60, 67–69  
獨生子女 (政策)／計劃生育 (政策) 22, 38, 60, 64, 76, 79, 87
- 方剛 9, 46, 54  
非正統的性 2, 9, 10, 35, 80, 86, 88, 89  
非正統的性別 2, 9, 10  
非正統的性主體 4, 18, 40, 76–78, 80, 81, 89  
復旦大學 23, 65
- 公共正確政治 10, 11, 60, 77, 78, 82, 83, 86, 89, 94  
公民 3, 85  
廣東 17–19, 71  
廣州 59, 63  
郭曉飛 9
- 「好的同性戀」／同志形象 85, 94  
何小培 (He) 9, 19  
華人拉拉聯盟 7  
戶口 20  
互聯網／網站／網絡／網頁／上網 3, 4, 9, 19–21, 23–29, 31–32, 36, 47–49, 55, 59, 69, 71, 74, 75, 80, 92  
婚姻／結婚 1–3, 6–11, 13, 22, 25, 34, 44, 47, 49–59, 62, 63, 68, 70–79, 81, 82, 86–89, 92, 94, 95, 97–100〔另見 異性戀婚姻〕  
婚外戀 35, 51, 54, 74, 98; 婚姻壓力／結婚壓力 3, 6, 9–11, 47, 52, 53, 62, 63, 70, 71, 74, 75, 94, 95; 同性婚姻 44,

- 81; 未婚男性 6, 25; 未婚女性 6, 7, 23, 53, 56, 57, 59
- 江紹祺 (Kong) 9, 21, 50  
 計劃生育(政策) 22  
 雞姦〔見去刑事化〕  
 警察／警方 21, 26, 27, 41-43, 45  
 金嘩路 (Kam) 9  
 經濟特區 20
- 康文慶 (Kang) 9  
 酷兒 3, 4, 12, 19, 20, 88, 89, 92, 93  
 電影節 12; 藝術展 12; 理論 92, 93; 時間  
 (queer temporality) 88; 生活 88  
 跨性別 1, 3, 4, 7, 8, 19, 34, 91, 92  
 女跨男跨性別 8; 女變男變性人 92
- 拉拉  
 家庭 33, 34, 76; 親屬關係 33, 34; 雜誌 3  
 (*les+* 3, 77, 83, 84); 已婚拉拉 11, 64,  
 71, 76, 92; 組織 3, 7, 8  
 拉拉／女同志熱線 28-30, 34, 64, 85  
 同心愛滋病干預熱線／同心熱線 28, 29;  
 同心女同志熱線 5; 800 拉拉熱線 5,  
 30, 34  
 拉拉／女同志網站 3, 14, 19, 24, 25, 27, 74,  
 92  
 阿拉島 3, 24; 花開的地方 3, 14, 24, 27,  
 28; 深秋小屋 3, 24, 32; 1088 網站  
 14, 26, 27  
 拉拉營 4, 19, 32, 34  
 老姑娘 57  
 李銀河 5, 8, 9, 22, 40-42, 44, 45, 56, 58,  
 78-80  
 兩性收入差距 53  
 離婚 6, 22, 71, 83, 72-74, 94  
 劉大臨 8, 9, 37, 39, 46  
 流氓罪〔見去刑事化〕
- 劉人鵬 80, 81  
 魯龍光 9, 39
- 馬平 9  
 馬曉年 9  
 美國 12, 32, 44, 65  
 面子 59, 67  
 愛面子 78  
 磨鏡黨 17, 18
- 男同志、男同性戀 4, 5, 8, 9, 18-26, 28-30,  
 35, 36, 38-47, 49, 50, 53, 57, 59, 63, 71,  
 72, 74-77, 79, 82, 86-88, 91-95, 97  
 酒吧 26, 28 (百分之八十 26, Eddy's 1924  
 26, 28 )  
 男同志性工作 (money boy) 50  
 女同志  
 運動／運動者 19, 40; 親屬 33; 之夜／派  
 對／拉拉派對 14, 15, 20, 23, 26-28,  
 100; 小說 23  
 女同志酒吧 14, 23, 28  
 1088 酒吧 14, 26; 蝴蝶吧 28; 花開 1088  
 14, 15, 27; 紅吧 28
- 潘綏銘 8, 9, 41, 42, 46
- 敲詐勒索／勒索 25, 33  
 QQ 8, 28  
 去病理化／去醫療化 5, 22, 40, 41, 82  
 《中國精神疾病分類與診斷標準第三版  
 (CCMD-3)》37; 「自我不和諧的同  
 性戀」37  
 去刑事化／去刑罰化 5, 22, 42, 44, 45  
 刑法 22, 42-45, 82, 94; 流氓罪 4, 22,  
 41-45, 82, 94; 猥褻法例 42; 性犯罪  
 45; 雞姦罪／雞姦錯誤 40, 42-45  
 去政治化 81, 83

- 人權 44, 91  
阮芳賦 5, 8, 17, 22, 35, 37-39, 43-45
- 桑梓蘭 (Tze-lan D. Sang) 9  
沙龍 (聚會) 12, 23, 28, 30-32, 49, 64  
上海女愛工作組 / 女愛 7, 12, 29, 30-32, 34, 92  
《傷花》23  
身份 / 身份認同 1-4, 7, 8, 12, 14, 18-20, 23-26, 28, 32-35, 43, 47, 48, 52, 54, 60, 61, 65, 75, 78, 80, 85, 86, 91, 92, 94  
P 33, 47, 48, 61; T 23, 31, 33, 47, 48, 52, 61, 65, 70, 95; 不分 48, 61; TT 戀 31  
雙性戀 4, 7, 8, 19  
素質 50, 84  
孫中欣 9, 20
- 台灣 1, 4, 18-20, 23, 32, 34, 46, 47, 53, 73, 80  
天涯社區 24  
    一路同行 24  
同妻 92  
《同性愛》40, 43  
同性戀恐懼 / 恐同 10, 32, 77, 79-81, 83, 89  
同性戀青少年 86  
同性戀正統主義 50, 70, 78, 89, 94  
同志  
    運動 3, 5, 7, 8, 12, 19, 40, 80, 91-93; 社群 2-5, 7-12, 18, 20, 21, 23-25, 32, 34, 42, 44, 46, 47, 50-52, 69, 74, 78-80, 82, 85-89, 91-94, 96; 文化 4, 9, 18-20, 34, 47; 家庭 / 家戶 2, 76, 88, 89; 親屬 33, 34, 88; 組織 4, 32, 34, 42, 93; 政治 2-4, 7, 9, 11, 70, 77, 80, 81, 91; 空間 50, 88, 89, 95; 抗衡空間 88; 次文化 4, 9, 19; 主體 2, 3, 18, 84, 94; 網站 21, 24, 26-28, 74; 網民 25
- 網絡 / 網絡空間 10, 24, 25, 46-49, 64, 74, 84  
(網絡) 審查 21  
網絡敲詐案 25  
王小波 5, 8, 9, 22, 40, 45, 78, 79  
微博 4, 92, 93  
文化大革命 36  
無性戀 4  
吳幼堅 59
- 香港 1, 2, 7, 12, 14, 18-20, 23, 30, 32, 34, 46, 47  
香港同志影展 23  
香港智行基金會 23, 30  
行政處罰 / 治安處罰 42, 45  
性別表達 / 性別外表 52, 60, 61, 70  
性道德 22, 23, 40, 51, 77, 82, 94  
性健康產業 22  
性工作者 9, 50  
(性) 科學 8, 22, 23, 36, 37, 40, 46, 77, 82, 83, 91-93  
性偏離 / 性異常者 / 性反常者 / 性變態者 / 性異議者 / 性偏差者 / 性「變態」的女性 18, 22, 38, 40, 52, 56, 62, 78, 82  
性權利 43  
形式婚姻 / 合作婚姻 3, 11, 47, 52, 57, 63, 72, 74-76, 77, 81, 86-89, 92, 94, 95  
新自由主義 21
- 亞洲 / 亞裔 19, 20, 32  
楊大中 9  
異性戀  
    體制 / 制度 3, 52, 63; (單偶制) 婚姻 1, 2, 6, 7, 11, 34, 49, 51, 52, 63, 74, 76, 81, 88, 89, 92; 管制 / 管控 6, 88  
異性戀中心主義 45

異性戀正統主義／異性戀正統規範／正  
統異性戀 3, 5, 6, 52, 70, 76, 77, 88, 89,  
94

曾靜 9, 46

張北川 5, 8, 22, 39, 40, 43

## 英文條目

Acker, Sandra 13

Brown, Wendy 81

Chen, Yaya 9

Chen, Yiqing 9

Cho, John 87

Choi, Kyung-hee 9, 20

Duggan, Lisa 50, 77

Eng, David 9

Engelbrechtsen, Elisabeth 9, 81

Evans, Harriet 5, 8, 9, 22, 35, 36, 41, 43

Farrer, James 9, 20

張明園 37

正常化 11, 48, 77, 82-84

樞子白 (Ni, Tracy) 23

周丹 9, 44, 87

周華山 8, 46, 78-80

Halberstam, Judith 88

Ho, Loretta Wing Wah 9

McMillan, Joanna 22

Ni, Tracy 23

Rofel, Lisa 5, 8, 9, 21, 50, 53, 77, 78, 85, 94

Sang, Tze-lan D. 9

Stacey, Judith 13

Wang, Hui 21

Warner, Michael 77, 89

Woo, Margaret Y. K. 22